



从

俘虏到战友

——记八路军 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Cong Fulu Dao Zhanyou

徐则浩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徐则浩 著

Cong Fulu Dao Zhanyou

从

俘虏到战友

——记八路军 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鹏生

装帧设计:宋文岚

责任校对:曹芝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俘虏到战友——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徐则浩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2-02626-3

I. 从... II. 徐... III. 敌军工作—中国 IV. E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765 号

从俘虏到战友

——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徐则浩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99(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10 1/16 印张:12.75 字数:160 千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626-3/G·730

定 价:30.00 元

印 数:00001-03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金冲及

十分高兴地读到老友徐则浩同志的新著：《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瓦解敌军，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政治工作重要原则之一。但要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做好这项工作，它的难度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所能想象的程度。尽管日本士兵大多来自劳动者，本人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可是，有别于以往的国内战争，它是发生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民族感情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长期在军队中灌输“武士道”精神，抹杀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仿佛只要“为国捐躯”便是无上光荣，而放下武器（更不用说掉转枪口）却是奇耻大辱；再加上语言等种种困难，使这项工作愈加难上加难。

我读过一本《朝日新闻》来信汇编的《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这本书的编者法兰克·吉伯尼在谈到被俘日本士兵的艰难处境后写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当事人的来信也充分说明这个事实。

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它使不少日本士兵实现了“从俘虏到战友”的转变；他们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重上战场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在战后又回国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积极推进者。

这确实能使没有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年轻人感到惊讶：看起来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怎么竟能成为事实；也会使他们接触到这个问题时产生一种悬念，想进一步了解它是怎样做到的。

徐则浩同志这部新著正是力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一直知道他近

年来在王稼祥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没有想到他在年过七十以后又写出这样一部专著。粗粗读了本书后才知道:他这位有心人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搜集和积累资料,以深厚的史学功力,将纷繁而分散的原始资料进行细心的梳理和分析,尽可能用可靠的事实来说话,对这个十分重要而过去却缺少认真研究的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明白的说明。

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以上这些,只能说是自己读后的一些粗浅感受,也多少是表示对这本著作出版的祝贺之意。

2004 年 6 月 16 日

目 录

引 言	(1)
八路军、新四军的组建	(5)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	(5)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10)
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队伍	(13)
瓦解敌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18)
日本的侵华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战争	(18)
日本士兵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20)
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24)
建立健全敌军工作机构	(29)
敌军工作机构的开始建立	(29)
敌军工作机构的逐步健全	(33)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作用	(36)
开创敌军工作的新局面	(38)
对敌宣传工作	(44)
对敌宣传工作的原则	(44)
调查研究是做好对敌宣传工作的前提	(53)
对敌宣传工作的方法	(57)
宽待俘虏政策	(64)
宽待俘虏政策的基本内容	(64)
不杀俘虏,不侮辱俘虏	(65)
生活上优待俘虏	(68)
释放俘虏	(71)
宽待俘虏政策的延伸	(75)
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和反战活动	(79)
最早一批“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79)

觉醒联盟晋东南总部和华北各地支部·····	(82)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华北各地支部·····	(90)
反战同盟华中各地支部·····	(96)
冈野进在延安·····	(100)
冈野进秘密到达延安·····	(100)
冈野进的主要活动·····	(103)
冈野进真实身份的公开·····	(107)
日本工农学校·····	(110)
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	(110)
隆重的开学典礼·····	(116)
改造世界观的熔炉·····	(122)
培养反战人才的摇篮·····	(127)
并肩战斗的战友·····	(133)
1942年:敌军工作进入新阶段·····	(138)
敌军工作新阶段的标志·····	(138)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	(144)
华北日本士兵两个反战大会的召开·····	(147)
整风运动促进敌军工作的新胜利·····	(151)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55)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的执委会议·····	(155)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华北地方协议会的成立·····	(160)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的成立·····	(167)
日本投降和日本战友回国·····	(173)
日本投降和解放联盟参与各地劝降受降·····	(173)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举行出发纪念大会·····	(179)
日本战友分批回国·····	(183)
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丰碑·····	(187)
后 记·····	(196)



引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本书所记述的,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中一批“日本兵”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这批“日本兵”是怎样由俘虏转变为战友的?这批“日本兵”在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又是怎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化敌为友、化敌为我、化腐朽为神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在波澜壮阔的中外战争史上也称得上是一大奇观。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他的论著中揭示了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交战国双方都是为了掠夺和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提出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加快国内革命危机的形成,以推翻本国政府的统治;号召交战国双方的士兵应当在战壕里联欢。列宁领导的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利用了世界大战的间隙和沙皇俄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突破了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而取得胜利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则并不相同。日本法西斯军阀、财阀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侵入中国领土,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完全是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战争。外敌入侵,民族危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的

完整。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士道”精神、用进行所谓“圣战”等种种欺骗宣传,灌输和毒害日军士兵,驱使他们走上侵华战争的战场。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抗日军队,义愤填膺地与敌拼杀,而直接面临的拼杀对象则是广大日军士兵。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广大日军士兵出身工农,他们在国内也是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服兵役来华作战,是由于受蒙蔽受欺骗,他们并不了解所参加的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因此,只要他们在战场上放下武器,停止攻击,就不应当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而应当把他们当作朋友、兄弟对待。正是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开始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瓦解敌军历来是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大优势是战争的正义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中国各族人民都充分动员起来的战争,也得到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热爱和平、主持正义、反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来华作战的日军士兵,一旦觉醒,也必将支持这场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军工作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实行宽待俘虏政策则是联结点、切入点。

八路军、新四军从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入手,实行宽待俘虏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就为彼此沟通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首战告捷,战果辉煌,毙敌千余,但却没有捉到一个俘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引起深思。这固然是由于日军士兵宁死不肯缴枪的缘故,但也必须重申实行宽待俘虏政策的道理,广为宣传,并且把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作为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的战场纪律。

日军士兵被俘之初,有的很恐惧,有的仍很傲慢,有的还打骂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和医护人员,有的甚至还组织集体逃跑。尽管在寻求沟通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坚持在生活上优待俘虏,想方设法照顾他们的民族习惯,对负伤者给以精心治疗,尊重他们的人格,诸如此类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



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外战争史上也堪称典范。日军俘虏们慢慢地领悟到八路军、新四军对他们的宽待、爱护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心实意的,是真正把他们作为朋友、兄弟看待的。本书中引用了当年几位俘虏的回忆材料,他们异口同声讲述了这个事实。

有了沟通,才能开辟对话的渠道。对话,碰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八路军、新四军中为数甚少的在日本留学过的或者懂日语的人,成为对敌军工作的宝贵人才。他们向部队指战员教几句简单的日语,以应战场上喊话的急需。他们同俘虏对话,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耐心地向他们宣讲战争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原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同时又听取他们讲述在日军所在部队的情况、他们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想法和要求。有了对话,才可以逐步化解。对话的结果,涌现出了一批觉醒了俘虏。怎样才算觉醒?觉醒的主要标志,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这场战争的侵略性有了认知,有了反战的态度。于是,在1939年1月,他们中间有3位进步分子在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正式参加八路军,并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仪式。这是八路军中的第一批“日本兵”。

八路军、新四军各前方部队对日军俘虏凡是愿意回去的,都支持他们回去,那时确实也这样做了。后来,因为回去的俘虏不少被杀害了,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更多地鼓励他们留下来。前方部队对俘虏进行短期教育训练,然后让他们随部队行动,使他们耳闻目睹八路军、新四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是一支有强大战斗力和优良作风的部队,同他们原先所在的日军部队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也增加了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信赖和敬仰之情。在延安,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倡议,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前方部队从日本俘虏中的进步分子选派,每期学习时间大体为一年,开设各门课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结业后又派到前方。日本工农学校既是改造俘虏的熔炉,也是培养干部的摇篮。

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军工作开拓了新的局面。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本兵”,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呈现出许多特点:第

一,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而是成批的、数以百计千计的;第二,不是分散的,而是有组织的,创建了有明确的反战反法西斯宗旨的团体——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联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不是对八路军、新四军作一般的支持和声援,而是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部署下,并肩战斗,步调一致;第四,也不是在战场上承担对敌冲杀的任务,而是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战场喊话和其他宣传方式,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日军士兵,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到了1944年6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能够作出这样的规定:“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应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军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连作为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盟军——美军也深感惊讶。1944年10月美军派出观察组到延安,作了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说是要学习中共对日军进行心理战的经验。

日本投降后,这批日本战友先后回国。他们在日本法西斯军部的驱使下离开日本,走上了侵略中国的战场,短短几年间,朝着完全相悖的方向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他们回国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见证者、传播者和推动者。这批日本战友中,小林清是唯一一位一直留在中国战斗和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天津市办了离休,成为受到中国人民尊敬的离休老干部群体中的一员。还有一批日本战友,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再也没有能够踏上回国的道路,但是他们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他们的业绩和正义壮举,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同在,与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谋求发展和繁荣的事业同在。

八路军、新四军的组建

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它的前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和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必须简要地概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不宣而战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几天时间内先后占领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全国各族人民眼看大片国土丧失，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风起云涌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先清内匪才言抗日”的主张，对外敌人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为“救国保种”而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运输队、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和协助十九路军作战。由张治中任军长的第五军部分官兵也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爱国官兵坚持抵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取得重大战果，日军被迫三易主帅，增兵10万，仍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而国民党政府提

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实行停火,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却反而不受此限制;还承诺取缔抗日活动。这是一个妥协、屈辱的协定,遭到了上海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在巩固和加强对东北的统治、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日军于1933年1月初攻占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又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及长城以北地区。同年3月5日,又发动了长城之战,驻守长城的30万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重创日军,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但是,爱国官兵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苦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侵华日军突破长城防线后,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代表熊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交“备忘录”,主要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中国驻河北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禁止一切抗日活动。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方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

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这两个“协定”,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脱离中国。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天津的爱国学生发出了悲愤的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在12月9日这一天组织发动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激发了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严重威胁和阻碍了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以武力霸占华北的野心,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超出驻扎区横冲直撞,多次向中国军队挑衅,蓄意挑起冲突。6月,日军又将驻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的两个多联队调至北平附近的丰台一带。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报告中提出,“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通过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联作战的准备。近卫内阁也认为,此时是对华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把中国的抗日激情压下去,“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了上风。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挑衅,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城搜查,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正当交涉还在进行中,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所部奋起抵抗。7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称作“华北事变”。日本首相和陆海军首脑给天皇的奏本也得到批准。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反诬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事变,声称“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1929年秋,资本主义各国(首先是美国)陆续卷入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达4年之久,是历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1700亿美元还要多;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国际贸易减少了33%。危机还扩展到农业、商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危机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共有4000多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失业工人数,美国有1700万,德国有750万,英国有350万,日本有300万,意大利有100万,法国也有近100万。失业工人饥寒交迫,游离失所,只有投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别无出路。示威游行、罢工连续不断。美国125万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法国在1930年爆发1700次罢工,约85万人参加。德国在1930—1932年爆发1000多次罢工。英国在1930年罢工人数为30万,1931年增至50万,还爆发了水兵暴动。资本主义各国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得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如坐针毡,想方设法寻找对策。德国、日本公开建立法西斯专政,疯狂扩军备战;美国则由在1933年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实行“新政”,由国家干预来调整经济。这次危机于1933年结束,长期处于经济萧条后才稍现复苏,但是好景不长,于1937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恶性发展。

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将国内经济转入战争轨道,竭力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火生产,疯狂扩军备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亚洲和太平洋争夺霸权,把侵略战争的矛头首先对着中国。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源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法西斯专政。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久原、中岛等几家大财阀手中。其中有些新财阀对外侵略野心更猖狂,不满历届政党内阁扩军备战的速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法西斯势力活动猖獗,兵变、政变、刺杀事件接连发生。内阁频繁更迭。1930年11月,作为老财阀代表的滨口雄幸首相被法西斯组织“爱国社”刺伤,不久去世。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由犬养毅出任首相,荒木贞夫中将为陆相,军部势力增强。1932年5月,犬养毅被法西斯组织“血盟团”刺死,由海军大臣斋藤实组织所谓超政党的内阁。1936年2月26日,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在新财阀的支持下举行政变,企图推翻冈田启介内阁,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军方其他部队的支持而告失败。此时,在军队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主张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注意策略”,实行“断然改革”,深得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的支持。1936年3月在“统制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广田弘毅从1933年9月起,先后任斋藤内阁、冈田内阁的外相。1935年10月,他提出“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广田弘毅同军阀的关系密切,担任首相后,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加紧扩军备战,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编制扩大,兵力增加近3倍,形成了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

广田内阁实行比历届前任内阁更为反动的政策。在国内公然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活动,加强对石油、汽车、粮食等部门的控制,推行企业合并,加快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1936年8月,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要“确

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向南洋发展”。1936年，日本军队扩增到38万人，并加速扩充海、空军，军费比1931年增加一倍多，军国主义愈趋强化。日本军部大力鼓吹“武士道精神”，要求军人“忠君爱国”，把军队训练成为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法西斯部队。

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从1930年的滨口内阁到1936年的广田内阁的演变，终于完成了在日本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1936年11月26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协定规定德、日应密切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缔约双方必须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国内外直接效忠于共产国际者。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该协定。从此，德意日轴心国侵略联盟形成。

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在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1937年6月，近卫文磨受命组阁，出任首相，广田弘毅任外相。近卫内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军阀、财阀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内阁鼓吹“打破国际现状”和“获取资源”，力图用对外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于是继续强化战争体制，立即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国难当头，在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推动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对敌，从而构建了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前提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旗帜，主张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极力规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要从抵抗外敌入侵的大局出发，改弦易辙，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一方面对日本步步退让，接连签订了几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一方面又调集重兵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